



教学与研究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马克思需要范畴的哲学 澄明与当代反思

侯耀文

JYYWP2024024

2024. 4. 3

-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
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马克思需要范畴的哲学 澄明与当代反思^{*}

侯耀文

[关键词] 马克思；需要；欲望；想要；贪婪；需求

[摘要] 没有需要范畴的澄明，就没有需要理论的奠基。对需要范畴的界定和辨析，要结合马克思对需要与欲望、想要、贪婪、需求等范畴的区分使用，在作为动词和作为名词的语境下区别考察、分类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反思需要的本真意蕴和需要的错误观念。从马克思对两种不同词性下需要的区分使用来看，无论是在动词意义上表现为“必要的需要”、基于“必要的需要”基础上的“还应需要”，还是作为名词意义上表现为“需要的具体名词”和“需要的抽象名词”，其在深化唯物史观理解、揭示资本逻辑下异化需要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辅助性论证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问题意识、内在逻辑和特定理论价值。马克思需要范畴的哲学澄明，不仅对反思后工业社会的消费主义的“虚假需要”、物质主义的“物化需要”、单向度人的“片面需要”、加速社会的“加速需要”、生态主义的“无限度需要”等问题，而且对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作者简介] 侯耀文，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 100872）。

马克思关于需要的论述有很多，但是他本人却未对需要做过专门的详细界定，这导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对需要范畴至今难以达成共识。正如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莱恩·多亚尔（Len Doyal）和伊恩·高夫（Ian Gough）在其《人的需要理论》中所说，需要这个概念用途极广，以至于很多工作离开需要就不能顺利开展。但遗憾的是学界并没有界定清晰，而且“一直遭到滥用”^①。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没有客观人类需要的概念，就不可能迈出从‘是这样’到‘应该这样’的一步”^②。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以马克思关于需要的相关论述为依据，对需要与欲望、想要、贪婪、需求等范畴进行科学界定和区分，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里的消费主义的“虚假需要”、物质主义的“物化需要”、单向度人的“片面需要”、加速社会的“加速需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思想效应研究”（项目号：297522112321）的阶段性成果。

①② [英] 多亚尔、高夫：《人的需要理论》，汪淳波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6页。

要”、生态主义的“无限度需要”等进行批判性反思。

一、何为需要：马克思需要范畴的歧义与澄明

没有需要范畴的澄明，就没有需要理论的奠基。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对需要范畴的探讨主要有“需要的主观说”“需要的客观说”“需要的状态说”“需要的关系说”“需要的平衡说”。“需要的主观说”认为，需要是有机体对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要求在主体头脑中的主观反映。“需要的客观说”认为，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人的本性，表现为人对某种目标的渴望和欲求。在“需要的状态说”看来，需要是有机体为了维持自身正常运转而对外部环境产生的一种摄取状态，具体表现为内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需要的关系说”认为，需要是有机体为了维持自身正常运转而对外部环境产生的一种依赖关系。“需要的平衡说”则认为，需要是人与周围环境的平衡状态被破坏时所产生的对恢复平衡的期望。平衡破坏时会导致紧张状态，平衡破坏越严重，对恢复平衡的期望就越强烈。以上几种对需要的界定角度和方法各异，都有其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界对需要范畴的深入理解，但是由于这些观点的差异性、悖反性和局限性，给学界深入研究需要问题也带来了一定的理论困难。就连专门研究马克思需要理论的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也感慨：马克思的需要概念有时候是模糊不清的……它有时候是经济学的，有时候是历史哲学的，有时候是人类学的，但却几乎渗透到了他的思想的各个时期和不同领域。现在看来，学界之所以长久以来未能对需要范畴达成统一的认识，确实存在着探讨需要时没有区分词性和语境，把作为动词的需要和作为名词的需要混淆使用的情况。这样不仅会产生语境混乱，也会造成语义混淆。因此在探讨需要之前，要首先区分需要的词性和使用语境。

需要（Need）作行为动词时，有“必要的需要”和基于“必要的需要”基础上的“还应需要”两层意思。动词是用来表述动作状态的词汇。需要作行为动词时，总是指向一定对象（比如人需要食物、穿衣、劳动）的，常被时空、程度等副词修饰。当没有时空、程度等副词修饰时，需要常被用来作抽象意义的表达。需要有时空副词、程度副词修饰时，常被用来作具体意义的表达。比如我此时此地非常需要食物。所以，需要的对象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理解需要必须首先区分其在何种意义上进行界定的。在抽象意义上使用作为动词的需要，是脱离现实时空环境和程度的抽象表达，内涵十分贫乏，外延却十分丰富。从模态逻辑来看，“必要的需要”则是一种必然性判断，暗含着“不可或缺的、非要不可”的意思。对于“必要的需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曾明确指出，“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是“完全自然产生的并完全从自然必要性中成长起来的”。^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把这种“必要的需要”视为“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②。所以“必要的需要”就是“维持生命的需要”，马克思有时也称之为“必不可少的需要”和“自然需要”，当然，“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③，马克思认为这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基于“必要的需要”基础上的“还应需要”是一种应然判断，是在“必要的需要”的基础上“还应该要什么”。比如在满足自然需要的基础上，工人阶级还需要审美、需要享乐、需要交往、需要休闲等等。但是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

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却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①，把工人阶级“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②，甚至连对新鲜空气和身体运动的需要都应该被节约和克制。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不仅在最低限度上满足工人阶级的“必要的需要”，而且在最高限度上剥夺工人阶级的“应然性需要”，这实际上就等同于宣告了工人阶级只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性需要，如马克思所指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工人除了维持生命的需要之外，“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都没有别的需要了”^③。所以，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视域下对工人阶级的本真需要的遮蔽和剥夺，内在地要求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需要的革命”。

需要作名词时，分“需要的具体名词”和“需要的抽象名词”，都是对事物的“依赖和要求”。需要作为具体名词时，指的是主体的具体性需要。具体性需要体现在需要的社会性、历史性上。换言之，人的具体性需要必然存在于特定的时空场域。首先，具体性需要表现在共时性的空间结构中，因而具有摆脱不了的社会性。需要是现实的个人产生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人的需要决定了任何人都不能脱离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因为“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④。所以任何人一旦脱离社会，他的需要就不可能被满足，因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⑤。其次，具体性需要表现为历时性变迁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需要的具体表现也不相同。这是因为人与动物不同，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性需要进行生产活动。针对施蒂纳把羊或者狗也视作历史性存在的做法，马克思曾给予了尖锐批判，他指出：“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⑥在马克思看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的生产能力的提升，人的需要的范围和层次也会历史性地不断扩大，而羊和狗并不遵循这样的逻辑。需要作为抽象名词时，指的是主体的抽象性需要。抽象性需要是指脱离实践活动和感性现实的需要。对于抽象需要，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德国的哲学家们，还是政治经济学的“老学究们”，他们都习惯于从抽象的理论中理解和满足人的抽象需要。对于前者，费尔巴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把满足其抽象的生物性需要的“吃喝的东西”当做人的本质。对于后者，瓦格纳就是这样一个学究教授。他认为人和需要的“外部的资料”不是以实践为中介建立起来的“劳动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但在马克思看来，人与满足其需要的“外部的资料”并非只是理论上的关系，相反，他们之间首先是一种现实的“劳动的联系”。人必须首先满足现实的吃喝等感官需要。如他所强调：“并不‘处在’某一关系（在此特指理论关系——引者注）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⑦

综上所述，不同使用语境下马克思的需要范畴的理论内蕴有所不同。但是，马克思的需要范畴无论是在动词意义上表现为“必要的需要”、基于“必要的需要”基础上的“还应需要”，还是作为名词意义上表现为“需要的具体名词”和“需要的抽象名词”，其在深化唯物史观理解、揭示资本逻辑下异化需要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辅助性论证上，都表现出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内在逻辑：一是对唯物史观理论的深入阐发和论证。“需要”之于唯物史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唯物史观的整个学说就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建构起来的，而需要又构成了“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一切活动的起点。马克思认为唯心史观的一大错误就在于他们习惯于用头脑中的思维，而不是用“现实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

①②③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125、226、575页。

④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页。

侯耀文：马克思需要范畴的哲学证明与当代反思

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以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现实的人的需要出发，全面阐释了需要与观念的关系、需要与国家的关系，同时这也为唯物史观找到了坚实的现实性根基。二是对资本逻辑下异化需要的揭示。在资本逻辑下，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了工人需要的否定性力量，使人们的需要处在不平等、不均衡、有差别和高度异化的状态。无产阶级不仅没有因为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否定而改善自己需要的状况，他们反而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和扭曲。雇佣劳动在导致劳动异化的同时，也把需要推向了异化。需要的异化体现在需要越来越粗陋化、片面化、物化、平面化、工具化、两极化、病态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需要”对所谓的“本真需要”的遮蔽，使工人阶级逐渐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需要由促进人的发展的力量，异化成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否定性力量。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需要状况，以人的需要异化来阐释资本的运行逻辑，不仅赋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人学视野，而且揭示了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人民性。三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辅助论证。按照马克思的理解，需要是人的本性，任何人都有需要的权利。然而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无产阶级的本真需要要么被剥夺，要么在资本逻辑中被异化，以至于他们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反而陷入了自身发展的悖论中。这说明在私有制下，无产阶级的需要不可能得到满足。若要实现无产阶级需要的解放，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一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和需要的先进制度，而这种制度就是共产主义制度。虽然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后，还需要经历较长时期的过渡阶段才能最终实现“按需分配”的美好愿景，这一美好愿景是马克思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的科学预判，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应然性，还有实践上的实然性。所以，马克思的需要范畴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需要理论，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理论逻辑。

二、界定和区分：需要与欲望、想要、贪婪、需求

无论在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时代，还是在后工业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由于区分不清需要与欲望、想要、需求、贪婪的差异，往往错把欲望、贪婪、想要、需求当作需要，要么导致掉进人性的“黑洞”（如极端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等），要么导致生产、生活上的生存危机（如经济危机周期性呈现、生态危机持续性爆发等等）。所以，准确把握马克思对需要与欲望、想要、需求、贪婪的区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十分必要的。加拿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莱斯（Leiss William）曾一度想对这些范畴进行区分，但由于它们的习惯用法的界限并不明显而不得不承认这些范畴的差别无法进行严格的学科区分。他认为可以在一些相关文献中找到这些词汇的一般用法。在他看来，社会学和人文主义心理学常用需要概念，经济学常用欲望和需求概念。虽然莱斯从一般模式上对这些概念大致进行了学科分类，但对于这些概念的差别，莱斯也不得不承认，“用词的差别本身就在抑制有关满足问题的关键研究上有一定作用”。“由于人们所使用的概念上的不同，因此要为高强度市场下的具体社会状况发展一种完整的见解极为困难”。^①正是囿于种种困难，莱斯坦言，为了忠实于查阅的文献资料，他在《满足的限度》一书交替使用了这些概念。从莱斯的“未竟的尝试”来看，我们认为，虽然这些概念难以区分，但是依循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沿着莱斯的路子进行区分还是十分必要和可能的。

欲望（Desire）是抽象名词，是想要满足某种官能享受的自然心理生理现象。欲望表现为对对象物的渴求，欲望反映得越强烈，所激发的活动积极性就越强。在西方哲学史上，欲望常被作感性化的理解，哲学家们对欲望与理性的态度大相径庭，造成了他们有人倾向于主张“消解或者征服人类欲

^① [加] 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李永学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9页。

望”，有人倾向于“在欲望的本质中发现哲学的真理”^①。虽然哲学家们对欲望要不要服从理性观点不一，但大都承认它是人的自然本性的体现。德国古典哲学延续了这种传统。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就是欲望”^②。他把欲望和自我意识相关联，认为欲望是低级的，“理性的狡计”驱使欲望为它工作。费尔巴哈更是以“我欲故我在”^③建立了他“无欲则无我”的感性哲学。在他看来，“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④。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的启发，认为人的欲望不依赖于它的对象而存在，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本有的，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自然力和生命力的体现。马克思认为欲望具有能动和受动的二重性。从能动性的一面来看，人是具有生命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种能动性是人的自然力、生命力的体现，是人的天赋和才能，并且“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⑤。从受动性的一面来看，人和其他的动植物一样，也会受到客观环境、条件等的制约和限制，“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⑥。也就是说，人发挥能动性的对象是存在于人之外的，它不依赖于人而存。“受动的”（leidend）这个术语来源于费尔巴哈，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只有受动的和需要的存在物才是必然的存在物，因而受动性的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需要的对象。人正是经由满足需要的对象性活动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马克思还拿饥饿举例，认为饥饿作为一种自然的需要，是“身体对某一对象的公认的需要”^⑦，人为了解除身体的饥饿就需要自身之外的对象。但人的身体被饥饿解除后，一旦被美食刺激还会有吃的冲动。这个冲动就不再是需要，而是不合理的欲望，因为此时的受动性的制约条件已不再允许继续进食。如果人为了满足解除身体的饥饿之外的食欲，不顾胃的承受限度而继续摄入美食，这就必然会对胃造成伤害。所以说，与需要是适度的、合理的不同，人的欲望有适度与不适度之分。不适度的欲望通常表现为两种：一种是欲望低迷，比如出现“低欲望社会”；另一种是欲望过度膨胀，把欲望变为贪婪。无论是欲望低迷还是欲望贪婪化，都是不利于人和社会发展的。

想要（Want）具有名词和动词词性，作为名词的想要是指“想望的东西”。作为动词的想要具有打算、意欲之意。但是打算能不能成行、意欲能不能实现则取决于是否遵循现实条件和客观规律。想要有时与需要相一致，有时却与需要相偏离。想要与需要的不同之处体现在，需要内蕴着想要的合理性，既强调目的合理性，也强调手段和过程的合理性，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一方面，想要若脱离了客观性、条件性、规律性和现实性，要么会沦为消极的“异化需要”“虚假需要”，要么会沦为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妄想。另一方面，想要若充分尊重客观性、条件性、规律性和现实性，就有可能发展成客观的需要。简言之，需要就是遵循客观条件和规律的想要。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想要，以其具有欺骗性的劳动学说来蛊惑人心。但他们这种妄图从学术上论证资产阶级的想要就是整个社会的需要的做法，并没有掩盖住“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⑧的现实。这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看来是想要的，但对占社会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来说，却不是需要的。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打着人民需要的幌子来实现自己的想要，但“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⑨。资产阶级的想要与无产阶级的需要的悖论在现实生产生活中必然会引起“需要的革命”。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

① Judith Butle, *Subjects of Desire, 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Fr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

②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6页。

③④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91、591页。

⑤⑥⑦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9、209、210、158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侯耀文：马克思需要范畴的哲学证明与当代反思

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①。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为无产阶级虚构的这种“虚假需要”极具欺骗性，是违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终将为人类社会发所扬弃的。事实上，无产阶级想要自由解放，就必须认清资本主义以自私的想要僭越整个社会的需要的企图，以“需要的革命”打碎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摧毁资产阶级的想要，重建无产阶级“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为主导的代表人类整体利益的社会需要。

贪婪（Greedy）是形容词，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欲望的强度。在具体使用时，常指一个人超越正常需要范围且无义务感的强烈欲求的性质，因此贪婪一般带有贬义色彩。需要和贪婪不同，需要具有道德合理性。在现实实践中，贪婪常表现为不知足、贪得无厌和极度自私自利，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不讲原则、不择手段、不惜损害社会利益。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及资本家的本性就表现为对利润的极度贪婪。因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②。为了指认资本的贪婪本性，马克思专门引用了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的论述：“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应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③ 贪婪之所以没有道德合理性，在于它的主体在实践中没有平衡好“能需要”和“应该需要”的关系，使“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分离，把利己与利他相对立。虽然贪婪的欲求在一定范围内也可得到满足，但往往因其主体的“不知足”和其满足手段的非道德性而广受人们谴责。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为中心逐利的资产阶级就是具有贪婪人格的鲜明主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对贪婪者做过专门论述，认为他们作为享受财富的人，往往“把别人的奴隶劳动、把别人的血汗看做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④。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与资本逻辑合谋对雇佣工人进行无情的蔑视和肆意践踏，把工人“看作可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自身却无节制地挥霍浪费和随心所欲地放纵无度。这种看似能够主宰别人、决定别人生存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卑鄙的幻觉”。因为在财富的异己力量面前，他自己也成了“自己财富的奴隶”。

需求（Demand）在马克思那里是政治经济学的惯常用语。需求和供给一样都有基于市场、交换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人的需要的满足物只有经过市场交换——也就是成为商品——才能成为需求的对象。所以在此意义上讲，对商品的需求就是由人的需要通过市场交换产生的，没有市场和交换就产生不了需求和供给。按照马克思的理解，需求也有内在区分。他曾经把供给和需求处于均衡状态的需求叫做“有效需求”。事实上，马克思对“Bedürfnis”（需要）“Nachfrage”（需求）有专门的区分使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笔记本Ⅳ中，马克思曾这么区分需要和需求：“需求和供给的情况也是这样，因为在简单交换中是以对产品的需要为前提的。生产者（直接生产者）自己的需要表现为他人需求的需要。”^⑤ 从马克思的此段论述来看，人由于对产品的需要触发了交换，交换保证了需求和供给的实现，然后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才成为了“他人需求的需要”。除了在《1857—1858年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87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7页。参见德语原文：Wir haben vorhin bei dem Verwerthungsprocess des Capitals gesehn, wie er den einfachen Productionsprocess als früher entwickelt unterstellt. So wird es sich mit Nachfrage und Zufuhr soweit verhalten, als im einfachen Austausch Bedürfnis für das Product vorausgesetzt wird. Das eigne Bedürfnis des Producenten (des unmittelbaren) als Bedürfnis anderer Nachfrage. 在此德文原文中马克思用的是“Bedürfnis”（需要）和“Nachfrage”（需求）。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Abteilung II, Band 1.2, Dietz Verlag, 1981, S. 320.

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需要和需求的范畴区分使用还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Ⅲ手稿（其中一节的小标题就是“需要、生产、分工”）和1847年所写的《需求》札记中。在前者中马克思使用的是德语词汇是“Bedürfnis”（需要），此处马克思使用需要恰好说明了在生产分工阶段人的需要还没有经由交换成为商品，所以也就没有成为商品交换和流通阶段的需求。在后者马克思使用的是“Nachfrage”（需求），在这篇札记里，马克思对需求做过明确的论述：“需求创造贸易，那么，最初的贸易又是由需求创造的。需求是贸易的物质内容——交换对象的总和，用来进行交换和贸易的商品的总和。”^①而且他在该札记的第一句就明确了其政治经济学的使用语境：“在大多数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几乎只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待需求”^②。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需求范畴的政治经济学使用界限。

需要是人的各种实践活动的积极动力，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积极确证。易言之，需要是积极合理的、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欲求。举凡不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都谈不上是真正的需要。对于需要与想要的区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对此有着相似的理解。阿德勒认为人的需要不会错，但是人却会因错误的想要而误入歧途。如他所说：“我们的需要永远不会过分，但我们的想要却常常太过分”^③。对于想要而言，如其遵守客观规律和实践理性，就会促进人的生存和发展；反之，如其忽视现实条件和客观规律，就会受到实践惩罚，进而阻碍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于需要与欲望的关系，在精神分析学家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看来，需要具有现实的对象性，而欲望则是一种心理愿望。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拒斥弗洛伊德生物主义需要—欲望观，基于全新的主体理论建立了“需要——要求——欲望”三元模型。在这个三元模型里，人的身心内在地存在着需要向要求的转化。在拉康看来，要求与需要不同的是，要求的对象“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是用语言表达出的需要（拉康称之为“能指的峡谷”）。拉康认为“在要求和需要分离的边缘中欲望开始成形，这个边缘地带是要求以需要会带来的那种没有普遍满足（称之为‘焦虑’）缺陷的形式开辟的”^④。要求构成了拉康“需要——要求——欲望”三元模型的关键中介，“要求是拉康用来表征从具象的需要到非具象的欲望的一个中间环节”^⑤。

综上所述，与需要具有合理性的一面不同，欲望、想要、贪婪、需求具有二重性：它们既有促进人的生存和发展积极面，也会阻碍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消极面。对欲望而言，一方面，欲望过度膨胀和无限放纵，就会对人的生存和发展起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欲望被强制性压抑和禁止，或者人一直处于低欲望状态，人实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性就会减弱下来，从而人就无法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对于贪婪而言，从短期性来看，它虽然也能一时促进人的生存和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其极端利己主义倾向，决定了其满足促进的只是少数人的生存和发展，这种非道德性欲求最终也会陷入贪婪的悖论，进而阻碍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就需求而言，如果供给与需求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此时的需求就成了既可以帮助提升人们的消费生活、也可以助力经济健康运转的“有效需求”；但是如果供给需求不均衡，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存在潜在的经济危机的可能。

结合上述马克思对欲望、想要、贪婪、需求具有二重性的论述和对人之欲望的本质澄明、资本本性的贪婪的揭示、资产阶级逆历史发展规律的想要的批判，以及对“Bedürfnis”（需要）“Nachfrage”（需求）的区分使用，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的需要范畴与欲望、想要、贪婪、需求等范畴有着本质差异。如果我们脱离马克思需要范畴的使用语境和其所发挥的理论功能，对它们不分语境、不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2、382页。

③ [美]摩狄曼·J.阿德勒：《六大观念》，郗庆华、薛生译，团结出版社，1989年，第77页。

④ 《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624页。

⑤ 张一兵：《伪“我要”：他者欲望的欲望——拉康哲学解读》，《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

加区分地混淆使用，不仅会造成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理论曲解和误读，而且会在观念上产生错误的需要认识，受到现实的实践惩罚。

三、错误观念反思：本真需要的遮蔽与回归

弄清楚哲学中的需要范畴，才能更好地反思错误的需要观念。区分了马克思的需要与欲望、想要、贪婪、需求等范畴，才能更好地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反思需要的错误观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本真需要的异化也在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不断表现出新的特征和形态。既有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反人民性导致的人们本真需要的遮蔽，也有源于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曲解造成的对马克思意义上的本真需要的遮蔽，还有源于后工业社会下滋生的需要的错误观念造成的对本真需要的遮蔽。

受马克思的影响，一大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比如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异化需要”问题进行了持续性的跟进研究。他们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和人的“异化需要”的新表现，对后工业社会需要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有意识的批判性反思。虽然他们对后工业社会的人的需要的新的异化病症开出了“诊断方案”和“医治药方”，以他们独到的理论视野和批判视角拓展了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研究视域，彰显了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理论效应和时代价值。但是由于他们缺少对马克思需要范畴的内涵澄清和语境区分，导致了他们对需要的错误观念和工业社会的人的需要的新的异化病症的反思依然不够彻底。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误读和曲解上，还表现在他们对工业社会人的本真需要的“祛蔽方案”和“祛蔽药方”上。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社会，明确需要与欲望、想要、贪婪、需求之间的本质界分，对当代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中“异化需要”的揭示和后工业社会需要的错误观念的纠偏依然是有必要的。

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性反思来看，在后工业社会，受资本逻辑的催动和牵引，人们不仅缺失了对满足本真需要的价值和意义的冷静思考，而且在无形中把本真需要“去理性化”，取而代之的是物欲意识、非道德化处境和本真意义的遮蔽。我们应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特点，基于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本真意蕴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性反思，对西方社会消费主义的“虚假需要”、物质主义的“物化需要”、单向度人的“片面需要”、加速社会的“加速需要”、生态主义的“需要限度”等需要的错误观念进行深度反思。

第一，消费主义的“虚假需要”本质上是被刺激起来的欲望。消费主义观念认为，无物不可以被消费，消费构成了确证人在消费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在现实中表现为对人的消费的强迫。特别是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合流，塑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消费需要的文化意识形态，使人们的消费需要从“对物的需要”变为“对符号的需要”。在大众传媒的支配下，人的主体意识被媒体符号驯化，人的需要被引向“转欲望化”，本真需要被遮蔽。正如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由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竭力支撑着的恶魔般的世界，这个时时威胁着我们每一位的世界”^①。这说明由大众传媒刺激起来的消费主义“虚假需要”已成了人们满足正常生活需要的极大消极因素。鲍德里亚曾对消费社会的“转欲望化”本质做了剖析：“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②。需要和欲望最大的不同就是人的需要具有合理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总有资本和制度的外界力量通过具有欺骗性的手段把正常合理的需要强迫性地“转欲望化”，使人们误以为被资本操纵的官能欲望就是他们的合理性需要。实际上，他们被制造和驯化的官能欲望，只不

^{①②} [法]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过是资本满足自己的贪婪的工具。从根本上说,消费主义的“虚假需要”已经不是本真的需要,而是被外界操纵的“去理智化”的消费欲望。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也对消费主义需要观念提出了质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个人在其物质生活上的需要及满足程度日趋丰富,但是这种需要却不是人的原始需要,而是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消费模式从外面强加于人的‘虚假需要’。”^①从上述来看,无论是鲍德里亚还是马尔库塞,都洞见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消费的虚假繁荣,并提出了独到的理论见解,其目光无疑是敏锐的。但是在原始需要的祛蔽问题上,如果我们没有对需要范畴足够精准的辨识,就很难对当代资本主义通过符号宣传来强化人们的虚假需要进行批判。

第二,“物化需要”实际上是一种去理性化的物质欲求。“物化需要”的生成和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及唯经济主义的生活观念密切相关。按照马克思的理解,需要的对象物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物是工具,人是目的。然而物质主义的需要观念恰好相反,坚持物质至上,搞物质崇拜、物质迷信、物质享乐。物服从于畸形的欲望而非服务于人的健康发展。它使一些人及其社会关系完全从属于物质逻辑,只注重物质利益和生活享受,人的道德规范、伦理价值被放在次要位置或完全被忽略。虽然在物质主义的逻辑下,人们也需要占有物质,但是这种占有已经失去了理性的规制,从满足合理需要的实践活动演化成了只满足主观欲求的享乐主义活动。因而“物化需要”在消费生活中表现为对物的非理性占有和极端崇尚。从本质来看,“物化需要”还是一种“异化需要”,是一种对物的极端占有欲。它不仅偏离了人的本真需要轨道,而且使人成了消费物品的奴隶。人一旦陷入极端主义的物质主义观念里,人就不能再支配物质,而是物质在统治人。在现实中要消除这种“异化需要”,要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文化的消费观念和文化土壤展开批判,从根源上厘清“物化需要”的本质和成因。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②,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弗里德里希·弗洛姆(Friedrich Fromm)曾把批判物质主义的需要观念和幸福生活联系起来,认为“物化需要”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拉康也认为,现代社会人们对欲望的消费和表达,实际上是一种“强迫性的精神分裂症”,不是人在消费物,而是物在消费人,不是人在表现欲望,而是欲望在奴役人。现代人被物欲牵着鼻子走,在“物化需要”中丧失了自主性,沦为了物欲的奴隶。从弗洛姆和拉康对“物化需要”的揭示来看,怎样从“物化需要”中解脱出来,回归积极合理的“人的需要”,是现代人必须反思的问题。

第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单向度需要”本质上是“片面性需要”,是资本逻辑下人之生存异化在现实性需要上的必然体现。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不仅有需要,而且具有多向度的需要。人的需要的多样化和人的需要的多样化满足,是人的本质力量丰富度的积极体现和确证。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的多向度需要在不合理的制度下被极度贫乏化、单一化。资本为了实现自己增殖的欲望,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对利润的无限制的贪婪,罔顾普通人的本真需要。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的是资本增值和满足资本家追逐利益的无节制的欲望,而不是普通人的正常的合理地生存和发展需要。在这种制度下,资本和资本家的贪婪、欲望和人们的正常需要的对立是如此的尖锐和明显:一方面是资本及资本家的贪得无厌、不知满足,另一方面是被资本主义社会压制和摧残的人们需要的极端贫乏化。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指出,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特点。单向度不仅使现代资本

^①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② [美] 弗洛姆:《马克思论人》,陈世广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页。

侯耀文：马克思需要范畴的哲学证明与当代反思

主义社会严重病态化，而且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片面性需要深恶痛绝。在他看来，人的片面性需要在人的存在和发展上具有极大危害性，让人们建立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①，使人沦为饱受压抑和摧残的“单向度的人”。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把人的需要限制在单向度上，使人们身在奴役中而不自知，把人的生存和发展单面化、单一化。“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这种觉悟的出现却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这些需要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②。弗洛姆对人的这种片面性发展表达了深深的担忧与批评，认为追求整体性需要才能确证人的健全性，“片面需要”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异化的体现，“抑制了人们对于人类的生存问题的意识”^③，单向度的“片面需要”的错误观念是资本逻辑运演的必然结果。它不仅让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退化、审美意义缺失，也会使人们陷入虚无主义的焦灼。因此，对单向度的“片面需要”的超越内在要求着必须重建“需要的全面性”。实际上，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化，就是规避“片面需要”的中国作为。

第四，“加速需要”使需要的本真意义被遮蔽。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理论批判大纲》中，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率先提出了加速社会的问题，并对生活在加速社会里的人们“如何拥有一个美好生活？如果我们的生活不美好，那么问题在哪里”发出了疑问。在罗萨看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之所以出现了悖论性的一面，根源就在于现代社会由于科技加速发展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实现自主性的必要资源”^④，另一方面也“不断挤压着人们的生活时间”^⑤，造成了新异化的诞生。这势必导致“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物的逻辑。罗萨指出，“现代社会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的确已经不再让人们觉得是一件美好的事”^⑥。在他看来，需要的满足和消费的实现与个人幸福联系并不大，人的更多需要并非意味着人生活得更幸福。在不断加速的社会里，加速主义对时间性的崇拜，造成了时间对空间的挤压，“一切都越来越快”，人们像陀螺一样被需要牵引着加速生产和消费，淹没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生活生产快节奏的推动下，人们鲜有时间去追问为什么满足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体验如何。除了需要一直在生成和满足外，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无暇顾及，大多数人一直处在追求需要满足的混沌状态中。但是需要的本真意义却被遮蔽，而需要的快速满足和变换成了人们的主要价值诉求。在对需要的无限制地加速满足诉求中，由于人们受到加速主义的错误诱导，致使他们的需要意识也失去了应有的理智。罗萨明确反对传统上所认为的只要拥有足够多的丰富资源就等于拥有了美好生活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应该重新审视人的需要问题，实现对“资源拜物教”的超越。加速社会的“加速需要”理论颇合时宜地切中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悖论问题。“加速需要”的克服与扬弃，内在地要求“物的生产逻辑”的超越和关照人之生存状况的人学逻辑的回归。

第五，“无限度需要”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贪婪，并非意味着人类可以生活得更加幸福。从马克思的需要范畴与贪婪的区分来看，需要是合理的、始终处在合理限度内的。但在后工业社会人们却总是假借需要之名，行贪婪之实：以人类中心主义的贪婪和傲慢对大自然无限制地掠夺和索取，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由此而生的生态危机已经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面对需要的不可持续性危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主张从价值观念上反思人类需要的可持续性。正如尼尔·A·科尔曼（Neil A. Coleman）在其《生态政治》中所说，如果人类不从价值观念上进行反思，那么人

①② [美]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③ [美] 弗洛姆：《爱的艺术》，刘福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第7页。

④⑤⑥ [德]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1、3、6页。

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将沦为空谈。他提出必须有一种保护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来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来替代目前这个对自然环境破坏成性、权欲熏心之社会的价值观。把需要贪婪化并非理性的选择，相反是违背需要的生成和满足的客观规律的。对于需要的有限性和无限性问题，环保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艾伦·杜宁（Alan Durning）从伦理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了反思。在《多少算够：消费社会和地球的未来》一书中，杜宁对人的需要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了人的需要与自然的需要的和谐的重要性。在杜宁看来，人的“无限制需要”并非意味着人可以生活得更加幸福。他从营养学视角举例说明，正是现代人对需要和消费的过度营养化追求，才使得一系列富贵病（心脏病、脑血栓、胸癌、肠癌）等问题不断滋生。杜宁号召人们正视人的需要在社会中是有限的，要尊重自然，关爱地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他认为，地球供养数十亿人类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是否继续把消费等同于满足。^①生态主义对“需要限度的反思”告诉我们，如果人类不能自觉地区分合理的需要与不合理的贪婪，势必会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后果。事实上，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应该反思的迫切问题，也是当代人类社会需要共同反思的时代问题。中国学界也应该从马克思的需要范畴出发，积极参与到全球生态话语建设中去，并争取在理论上有所建树。

[责任编辑 孔 伟]

Philosophical Clarification of and Contemporary Reflection on Categories of Need in Marx

Hou Yaowe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 Marx; need; desire; longing; greed; demand

[Abstract] Without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need categories, there is no foundation for the need theory. The defin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ategories of need must be combined with Marx's distinction between need and desire, longing, greed, and demand, among others, and examined and classified among differing cases of being verbs and nouns; therefore,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and reflect on the true meaning and misconception of need based on the view of Mar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distinction and use of needs under two parts of speech, whether it is expressed as "necessarily need" in the verb sense, "should still be needed" based on "necessarily need", or as a noun in the sense of "concrete noun of need" and "abstract noun of need", the concept of need shows a certain problem awareness, internal logic and specific theoretical value in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revealing the need for alienation under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auxiliary arguments for communist revolution. The philosophical clarification of need categories in Marx ha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not only for reflecting on the "false needs" of consumerism, the "materialized needs" of materialism, the "one-sided needs" of one-dimensional people, the "accelerated needs" of accelerating society, and the "infinite needs" of ecologism, but also for meeting the needs of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

^① 参见 [美] 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和地球的未来》，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页。